

● 叶嘉莹 主讲
● 刘志刚 整理

阮

籍

咏

怀

诗

讲

录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

阮籍咏怀诗讲录

● 叶嘉莹

主讲

● 刘志刚

整理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阮籍咏怀诗讲录

叶嘉莹 主讲

刘志刚 整理

*

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)

邮政编码:300020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850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625 印张 2 插页 146 千字

1997 年 6 月第 1 版

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 7-5309-2620-9

I·99 定价:9.00 元

前 言

这一册《阮籍咏怀诗讲录》，原是60年代我在台湾任教时，为台湾教育电台播讲大学国文时之讲课录音。在播讲期间，我丝毫也没有要将所播讲之内容整理成书之计划，所以在当时并未把播讲之内容录音保存。谁知相隔三十多年后，竟然在大陆被整理记录成书。这实在是当初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件事。回思往事，从我之接受播讲的邀请，以至今日之编录成书，这期间原来颇有一些巧合的机缘。现在我就将这些巧合的机缘略加叙述，并对与这些机缘有关的友人们表示感谢。

先从当年被邀担任大学国文播讲的一段机缘谈起。我从50年代初即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，其后又相继被邀往淡江大学及辅仁大学两校兼课。当时在淡江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许世瑛先生与我家原有世交，且为我的师长一辈。当我渡海抵台经历过一段忧患之后，介绍我入台湾大学任教的，就是许世瑛先生。其后许先生任淡江中文系主任，遂又邀我至淡江兼课。及至60年代中，许先生因久患目疾，视力日损，其所担任的大学国文播讲课程之教材，则字体甚小，因而日感不便，遂坚意邀我去接替他的课程。最初我不敢接受此一邀请，一则是因为我那时已在三所大学任教，工作极为忙碌，实已无暇增加任何教课之任务；再则也因为

大学国文广播节目所选用之教材，其涵盖面颇为广泛，有些内容如《说文解字·序》之类，并非我所专长。何况此一广播之收听者乃是社会大众，我深恐万一在讲说中倘或有所失误，岂非愧对许先生之推荐。因此我对许先生之邀请，曾坚持甚久，不肯接受。但半年后许先生之视力已衰减至几乎不能阅读之地步，我遂终于不得不接受了许先生之推荐，接替了他的大学国文广播教学之任务。而今日所整理出版的阮籍的《咏怀诗》，则正是当日大学国文广播教学中的一篇教材。这自然是今日得有此书出版的第一段机缘。

不过我当日对自己所播讲的大学国文课程，既未曾录音保存，今日之有此一批音带，则是由于我自1969年到加拿大任教后，当时有几位从台湾来的研究生，他们知道我在台湾曾经有此套广播教材，希望能获得这些教材的录音做为他们自己课外学习之参考。我遂函请在台亲友与台湾教育电台联系，请他们为我复制一套音带寄至加拿大。当时台湾应允只能复制成圆盘式之大型音带，不能制成卡式音带，而若将全部广播教材都制成圆盘式音带，则数量极大，邮寄起来颇为不便，所以在台之亲友就只为我录制了教材中有关诗歌和辞赋的部分音带。而这些圆盘式音带，在播听起来时极为不便，所以当我收到这些音带后，就又请人为我转录成了卡式音带。多年来经过学生们的辗转播听，其中部分音带已经模糊不清，而且音带颇有失落，次第已不复衔接。何况从我自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后，这些音带已久被搁置不再被学生们借去听用。谁知两年前竟有在温哥华的一位友人施淑仪女士笃好中国文学，不仅热心于借取音带去播听，而且曾经为我将部分音带重加整理复制。恰好近年在天津有一些曾在南开大学听过我讲课的学生，正热心于整理我讲课的录音。于是我遂把施女士

为我重新录制的一套阮籍《咏怀诗》的音带，也带来了天津。这自然可以说是今日之得有此书出版的第二段机缘。

当我把这套阮籍《咏怀诗》的广播音带携来天津后，也并没有要请天津的几位旧日学生将之整理写出之意。因为她们所整理的大多是我近年来的一些讲课录音，而并不是我在台湾时代的广播录音。那些讲课的录音已经数量极大，当然一时无暇再整理这些广播录音。而说到我的讲课录音之被整理，也原有一段机缘。因为我过去在讲课和讲演时，一般都是不录音的，直到1978年夏天，美国东岸有一批爱国的文艺工作者，组织了一个文艺夏令营，坚邀我去参加。在那次聚会中，大多数人所发表的都是比较进步的言论，只有我所讲的乃是几首古典诗歌的评赏，我原以为我之所讲颇为不合时宜，谁知听众的反应竟极为热烈。当时在座的有一位在纽约联合国工作的尹梦龙先生，正在主编一册题名为《海内外》的杂志，他当时不仅把我的讲话全都录了音，而且很快就由他交给人整理出来在他的刊物中发表了。自此以后尹先生遂要求我把当时在加拿大讲授的诗词课，都录成音带寄给他交人去整理发表。这可以说是我的讲课之被整理发表的一个开始。其后我既养成了讲课录音的习惯，于是才有以后天津的旧日学生为我整理音带的工作。这几位学生虽是在南开听过我的课，但其实却都是天津师大的校友，那就是现在天津电大任中文系主任的徐晓莉，在南开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任秘书的安易，与在天津市铃铛阁中学任语文教师的杨爱悌，如果不是有她们三个人多年来对听我讲课（包括听录音带的讲课和整理）所表现的热心，我是不会把多年前在台湾播讲大学国文的音带携带到天津来的。以上种种当然也都是造成此一册《阮籍咏怀诗讲录》之得以辑录成书的另一些可贵的机缘。

不过，尽管有着以上的一些机缘，但是我之把阮籍《咏怀诗》的音带携来天津，却原来并没有将之整理成书的意思。如今之被整理成书，则是出于又一次巧合的机缘。这本书的写录执笔人——刘志刚先生，也是一位在南开大学曾听过我讲课的旧日学生，与舍侄叶言材曾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同班同学，目前在天津教育出版社任编辑室负责人。今年春天由舍侄陪同他及另一位他们同班同学、现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的赵季先生一同来看我，谈话间提及我这里有一批阮籍《咏怀诗》的教学音带，刘志刚先生当即提出愿为我将之整理成书的意愿。原来赵季先生在中文系读书期间就曾为我整理过柳永词的教学音带，文笔极好。我对他们这一班同学颇有信心，就同意了刘志刚先生的提议；而且此事也得到他们出版社的大力支持。此事商定后不久，我就离开天津返回了加拿大，其后又于6月去了美国。谁想到刘志刚先生整理的速度极快，7月我就在美国收到了他寄来的稿件。本来我以为这一批在台湾教育电台录制的播讲教材，整理起来要比我在课堂中讲授的录音困难得多，因为课堂中的讲授所面对的乃是现场的学生，平日师生间既有理解和情谊，而且讲课可以一气呵成，所以讲起来自然有一种生动流畅的气氛。可是在录音室中的播讲则不同了，录音室中所面对的只有一支冰冷的麦克风，气氛自然要生硬得多，何况每次录音只有半小时，开讲前还要播放一段音乐，而且为了听众程度之并不整齐，所以每次都要对教材的题目和页数，以及上一次的进度，做一些简单的交代。因此之故，录音带中自不免有许多重复之处，这些地方当然都需要整理的人重加剪裁和编排。从刘志刚先生寄来的文稿看，其文字颇为简净，可以想见他在整理中是必然下过一番重加剪裁和编写的工夫的。此外，如果把这批依据录音室

中的录音而整理出来的讲稿，与另外依据课堂中的讲课录音而整理出来的讲稿相比较，也许读者们就会发现后者虽显得更为流畅生动，但前者在注释和考证方面，却实在更为详尽。不同的讲授场合与不同的听众对象，自然会造成了讲授方式的种种不同。这一册《阮籍咏怀诗讲录》，乃是我在播音室中的讲课第一次被整理成书。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。至于内容中所讲的作者——魏晋时代的名诗人阮籍，及其《咏怀诗》，则我在本书的讲录中论述已多，在此就不再更加赘述了。

叶嘉莹

1996年10月16日写于南开大学

目

录

一 作者简介	1	其 八 平生少年时	92
二 咏怀诗概说	13	其 九 昔闻东陵瓜	102
三 诗歌赏析	17	其 十 步出上东门	110
其 一 夜中不能寐	17	其十一 昔年十四五	122
其 二 二妃游江滨	27	其十二 徘徊蓬池上	133
其 三 嘉树下成蹊	42	其十三 炎暑惟兹夏	147
其 四 昔日繁华子	53	其十四 灼灼西曠日	156
其 五 天马出西北	64	其十五 独坐空堂上	170
其 六 登高临四野	74	其十六 北里多奇舞	180
其 七 开秋兆凉气	85	其十七 湛湛长江水	190

一 作者简介

阮籍(公元210~263),字嗣宗,陈留尉氏(今河南省)人。

阮籍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建安文学之后正始文学时代的诗人。当时,正处于魏晋之交的时代,社会上有一群文士,他们崇尚老庄的道家思想,厌恶、不拘泥于世俗的俗儒的礼法。他们唾弃名教,以为经学是如此之破碎与支离,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任放、旷达、纵酒,安于放逸、恣睢。从外表来看,这一群文士都是放浪、恣纵、不守礼法的人物,可是,从他们内心深处来看,我们就会发现,他们的生活之所以如此的放浪、恣纵,是有一份内在的悲哀和痛苦的因素存在的。中国自东汉后半期以来,历经了“党锢之祸”、“黄巾之乱”,其后,又经过“董卓之乱”,形成了“三国”的分裂局面。曹魏之篡汉、司马氏之篡魏,这种种的战乱、篡夺,使得社会是如此的不安定、不可信赖,时代是这样的黑暗、没有希望。所以,当时许多文士在对现实失望之后,同时,又在现实的种种迫害之中无可逃避,不得已才过着这种放浪、恣睢的生活。像阮籍、刘伶,他们耽溺于饮酒,希望用饮酒来忘怀烦

恼，以饮酒来远离灾祸。当时，在这一群文士之中，最出名的是“竹林七贤”。

“竹林七贤”是指怀县(今属河南省)的山涛、向秀、尉氏(属陈留郡,今属河南省)的阮籍、阮咸,铄县(今属安徽省)的嵇康,沛国(今安徽宿县西北)的刘伶,还有临沂(今山东)的王戎。在“竹林七贤”之中,山涛和王戎虽然很崇奉老庄的道家学说,但也非常萦心于名位利禄,所以,他们二人的生平在“竹林七贤”之中是比较富贵、显达的,而不以文学著称,也没有留下很多很好的作品。向秀、刘伶、阮咸虽然留下一些作品,但不算很多,只有向秀的《思旧赋》、刘伶的《酒德颂》等较为著称。那么,在“竹林七贤”之中,真正倜傥不群,富有个性,而且在文学上又有较大成就的自然就是嵇康和阮籍了。这两个人的作品风格并不完全相同。阮籍作品的风格是寓意遥深,志气旷逸。前人评他们二人的诗,常说:“嵇诗清峻,阮旨遥深。”意思是说,嵇康的诗清新峻切,阮籍的诗意旨遥远、深微,难以测知。

关于阮籍的诗寄托之深远,是历来批评诗的人所公认的,所以,百世以下难以测其意旨之所在。而且,我们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,他的志气真是如此之狂放,如此之纵逸。嵇康所表现的是风格清峻,气宇傲岸。阮籍诗表现的则是这样的幽微、深隐,蕴藉深厚,不是明白地写出来的。嵇康的诗作得比较发扬,比较显露,有锋芒,有棱角,才高志逸。阮籍的诗则是“婉曲纒纒”,真是“怨诽而不乱”。如果以诗歌的艺术价值来说,嵇康的诗虽然也写得很好,但是,写得过于直率了,缺乏含蓄,没有蕴藉;阮籍的诗则正如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所说,屈原的《离骚》是:“国风好色而不淫,小雅怨诽而不乱。”虽然有一份哀怨之意,可是写得不是十分地激切,仍然有节制,很含蓄。所以说,阮籍的诗尤其富于蕴

籍、沉挚的意趣。在“竹林七贤”之中，在“正始时代”的作家之中，阮籍的文学成就可称为第一人。

阮籍的父亲阮瑀是“建安七子”之一，他的老师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学者蔡邕。阮瑀“工于诗文，长于书札”，诗、文和书信写得都很好，曾担任过曹操的记室。阮瑀、阮籍父子二人，可以说是“家学渊源”。

历史上记载，阮籍“容貌瑰杰，志气宏放，傲然独得”，“喜怒不形于色”。说他容貌长得非常俊杰，志气非常奔放，表现的态度是傲然独得。喜怒之情，他可以节制、隐藏在内心，而不形于颜色。为什么他形成了这样的作风呢？因为在他所处的魏晋之交的衰乱之世，不如此含蕴就不足以远祸全身。在阮籍的性格上，一方面他的生活非常放浪，秉赋有豪放的志意，不受一切外在的礼法的拘束；另一方面，他为了能够在衰乱之世委曲求全地保全自己，而在内心非常有节制。我们说阮籍的诗之所以写得这样寓意遥深，他的为人之所以这样喜怒不形于色，正是因为他有着两种相反的情感的缘故。在当时，有些人能够委曲地保全自己，果然就苟且谄媚，做了一些在品格上非常卑微的事情；而有一些人不能委曲地保全自己，就一味地豪放，因此而获罪，像嵇康就是如此被杀死的。阮籍是具有他那种放浪的情怀，同时，他也有在乱世之中为保全自己而委曲求全的一份苦心。他的诗之所以写得好，正是因为他有这种互相矛盾的两重痛苦和悲哀的缘故。

在历史上还记载着阮籍“口不臧否人物”，在他口中不轻易批评人的善恶。当时有一些人故意与阮籍谈话，像当年谗毁嵇康的钟会，也非常忌恨阮籍。钟会当时任司隶校尉，他“数以时事问之”，多次让阮籍对当时政事进行评论，希望从阮籍的口中得到他对当时一些人物的批评作为把

柄，然后再给阮籍加上一些罪名，而阮籍绝口不臧否人物，“皆以酣醉获免”，所以，钟会等人无从得到把柄，这也正表现出阮籍委曲求全自我节制的一份苦心。

历史上还记载着阮籍好读书，爱山水，常任意出游，“不由径路，车迹所穷，辄恸哭而返。”他喜欢读书，也喜欢游玩山水。他常常任意地驾上车出游，而不按着一般人所经过的路径而走，而是任意而行，当走到途穷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就恸哭着转回来。对于阮籍的这种行为，我们如果只是从外表来看，就会怀疑他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。因为每个人走路都是有目的的，都是要遵循一定的路线的，而阮籍是任意出游，既没有一定目的，又不遵循道路，而且途穷而返。他的这种行为正表现其内心深处的那一份悲哀。在他认为，生活在魏晋之世的黑暗、衰乱的时代之中，真是人生日暮途穷，无路可走。所以，他外表的狂放看似不正常的行为，实在只是内心的一份悲苦，一份幻灭的表现，是一种绝望的悲哀无可发泄的表现，因此，他走到穷途后就恸哭而返。

历史上还记载着阮籍有一次登上了当年刘邦与项羽作战的广武山，当他目睹旧时楚汉相争的作战遗迹时，不禁叹息道：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！”他认为可惜当年没有英雄，使得这两个小小的人物成名而流名千古了。我们说既然阮籍“口不臧否人物”，“喜怒不形于色”，那么他在这里所叹息的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从表面上看，他只是批评当年楚汉之争中的刘邦和项羽，认为当时没有英雄，使“竖子成名”了，而其实，阮籍是非常含蓄、蕴藉地表现了感慨古今的一份深意，他是在感叹在一个衰乱的时代，没有一个真正伟大的英雄人物能够拯拔、能够救济正处于水火涂炭之中的人民。他对时代危亡的慨叹和失望的悲哀之情，都在这两句话中

深深地表现出来了。阮籍还有一次登武牢山，当他站在山顶俯视国家的都城京邑时，于是就写作了一首豪杰诗，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和叹息：“登高望远，今古苍茫。”他想到了时代的危亡，想到了拯救危亡的豪杰之不可得，于是就表现出了一份很深的情意。

阮籍博览群书，尤其喜欢老庄之学。他曾经作过一篇文章，叫《达庄论》。文章所叙写的是老庄无为的修养精神的可贵。无为是一种消极的哲学思想，是一种衰乱之世的哲学思想，尤其是在阮籍所处的魏晋之交的时代，所以，他特别爱好老庄的学说，《达庄论》就是写这种无为的可贵。当时，有一个叫蒋济的人，官至太尉，他听说阮籍有很杰出的才能，就邀请阮籍到他的手下来做掾属，但阮籍不愿意去，于是他就奏记恳辞，写了一篇表达自己辞职愿望的奏记。然而蒋济大怒。“亲故乃敦勉之而就职，旋谢病归。”以当时蒋济的地位请他出来做掾属，而他不肯去，得罪了蒋济，这是对他很不利的东西。为此，亲戚、故旧都来敦促、劝勉他去就职，但他就职后不久就推说身体有病而辞职回家了。可见，阮籍真正的思想是不愿意在此乱世事奉这些做官的人物的。然而，阮籍毕竟曾经屡次出仕是为什么呢？前面我们曾分析过，阮籍一方面有非常放浪的志意，对当时的时代非常失望、不满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又有一种委曲求全的苦心，能够节制自己。所以，他屡次出仕又屡次辞官，我们从中正可以看到他内心矛盾挣扎的痛苦。后来他又做过尚书郎，“少时，又以病免。”日期也很短，他又以有病为由也辞掉了这个官职。当曹爽辅政的时候，曾经召请阮籍做他的参军，而“籍因以疾辞，屏于田里。”阮籍仍然以他自己有病而努力推辞，回去隐居在自己的田园之中了。当时，曹爽（曹真之子，曹真是曹操的养子）在魏明帝的时候权位极盛，

当明帝继位后，他曾经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还曾经录尚书事。可是，曹爽与司马懿意见不和，当魏明帝临崩的时候，魏明帝召曹爽与太尉司马懿两人一同来接受遗诏，让他们共同辅佐齐王芳。当齐王芳继位后，曹爽被封为武安侯。因此，曹爽就非常骄纵，他的饮食，所乘的车子，所穿的衣服，“拟于乘舆”，差不多相当于皇帝的享受了。像曹爽这样一个非常骄纵的人，阮籍当然是不肯事奉他的。当时，司马懿也很有野心，他在忌恨之下后来就把曹爽杀死了。曹爽失败以后，很多人非常佩服阮籍，认为他当时辞去做曹爽的参军一职是非常有远见的。此后，当司马懿为太傅和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做大司马的时候，都曾经请阮籍出来做从事中郎。高贵乡公曹髦(魏文帝之孙)继位后，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当国。司马昭曾任大将军，专擅国政，自为相国。他曾封阮籍做关内侯，又迁徙阮籍做散骑常侍，也曾任阮籍为东平相。阮籍在任东平相期间，其法令非常清简，政治非常清明。这样看，岂不是阮籍在司马昭当国期间也曾出仕吗？但历史上也记载着阮籍这样一件事：有一次，司马昭想替他的儿子司马炎向阮籍求为婚姻，要阮籍把他的女儿嫁给司马昭的儿子，阮籍知道司马昭的用意后，便常常饮酒，一醉达六十天之久，使司马昭的人一直没有机会与他谈及此事。可见，常常沉醉于酒也是阮籍委曲保全自己的方法。所以说，阮籍并非甘心依附权贵，他虽然在司马昭当国期间屡次出仕，也只不过是他在乱世中苟且保全自己的权宜之计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此后，阮籍“闻步兵厨善酿，贮酒有三百斛，乃求为步兵校尉。”他听说步兵厨贮存的好酒有三百斛之多，就要求去做步兵校尉。但时间不长，他又谢病辞归了。故史称他为阮步兵。

前文已经提及过司马昭，此人野心极大，曹髦当时就曾

说：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。”可见，司马昭的野心人人都知道。他曾杀了高贵乡公曹髦而立曹奂（曹操的孙子，史称魏元帝，后被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篡位后废为陈留王）。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的时候，司马昭权力盛极一时，有篡逆的野心。他自称“晋公”，受“九锡”。当时，像郑冲等一些司马昭的党羽，就联名劝进司马昭接受“九锡”。劝进的表文由谁来写呢？郑冲等人便让阮籍来写。阮籍对司马昭的篡逆野心是非常清楚的，怎么能甘心情愿写这样的表文呢？但是，嵇康被杀（景元三年）之事使他心存惧畏。他知道如果拂逆郑冲等人的意思，自己是无法保全的。所以，他不得已就接受了。

阮籍在《为郑冲劝晋王笺》中，表面上虽对司马昭表示颂扬，赞美司马昭可以媲美于当年的伊尹周公，齐桓晋文，可以成为辅佐君主的贤臣。但他在文章结尾的地方仍讽以“支伯”、“许由”，在暗中隐约地露出了讽喻的深意。他说：“然后临沧洲而谢支伯，登箕山而揖许由。”意思是说，当你辅佐国家功成业就之后，就可以到沧洲那里去见支伯，可以到箕山那里去见许由。支伯、许由是怎样的人呢？支伯和许由是古代的两个高士。《庄子》记载，舜要让天下给支伯，支伯不肯接受；尧让天下给许由，许由也不肯接受。所以说支伯和许由是尧舜让天下给他们，而他们不肯接受的人。阮籍在文章的结尾用此典故讽喻的深意是，希望司马昭不要有取天下的篡逆野心。如果能够在功成业就之后就放下这份功业，消除篡逆的野心而高隐起来，那才能真正证明你品格上的完美和高洁。可以说阮籍在此文中真是极尽含蓄之能事了，表现出他是在一种矛盾与被迫的痛苦之中写出来的。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篇表文写得是非常清壮的。就是在这一年，即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的冬天，阮籍死去了，

享年五十四岁。

关于阮籍的为人，历史上记载说，他“内心淳至，以孝称，而疏于礼法。”虽然他外表的行动很放浪，而真正内在的品性是非常淳厚、非常笃挚的，并且以孝顺著称。有一天，阮籍正和一位朋友下棋。这时，有人把他母亲死了的消息告诉他，他的朋友想要停止下棋，但他却对下棋的朋友说，请终此局。在一般人看来，母亲死了还要下完这盘棋似乎是很不孝顺的。可是，阮籍不在乎外表的虚伪的礼法，其实，他内心是极其悲哀的。下完这盘棋后，他就放声一恸，呕血数斗，而且“哀毁骨立，杖而后起”，这不是表面的哀毁，而是内心的极度哀毁。当时人们以吊丧为重，当中书令裴楷来吊祭阮籍母亲之丧时，阮籍散发箕踞，醉而直视。他就披散着头发，很没有礼貌地箕踞而坐，而且喝醉了酒，两只眼睛一直向前看，既不给裴楷答礼，也不哀哭。裴楷仍然尽他的吊丧之礼。当时有人问裴楷，既然阮籍没有给你答礼，你为什么还尽丧祭之礼呢？裴楷回答说，阮籍那样的人物是礼法以外的，他可以像他那样行事；我们是一般的寻常人，是在礼法以内的，是应该遵守礼法的。此外，阮籍疏于礼法，他遇俗士则白眼沉默，遇知己就以青眼相对。历史上记载说，嵇康的哥哥来见阮籍，他就以白眼相对；嵇康自己来见阮籍，他就青眼相对。

阮籍所处的魏晋之交的时代，天下纷纭，权奸与亲贵之间互相交讧，政情异常混乱。如果在行动举止上偶不小心，马上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当时的名士，很少有人能够保全自己的，不是同流合污，就是遭遇到杀身之祸。于是，阮籍就“脱略世事，寄情麴蘖”，“发言玄远，口不臧否人物”，为韬晦自保之计。他为了摆脱世俗的尘事，而寄情于饮酒酣醉。他说话非常玄妙、非常深远，让人莫测高深。在他口中不轻